

前几天去上海棋牌院为棋牌文化博物馆“爱国儒商王铭先生的象棋情”特展挑选、辨别一些老照片,投屏上打出几张我与王铭兄在四年前上海举办亚洲象棋锦标赛期间的合影,令我思绪万千。

我的耳边似乎又听见:“荣华,我们再合个影。”当时,我真的有点纳闷,因为我俩在新落成的上海棋牌院以及棋牌文化博物馆和明天广场等好几个场景都已经“摆拍”过,怎么这位老兄还没有过足瘾?当然,我积极地配合他,我们又留下了一张张合影。虽然有一阵子不见王铭兄了,但觉得他精神头不错,以为他病后恢复得挺好,很为他开心。

然而,过了半年光景,2019年5月下旬,从香港传来王铭兄去世的噩耗,我感到十分意外。后来和棋院的同事们聊起,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那时也许是做放疗的缘故头发已经掉光了,那头黑亮的头发其实是假发,而他一再地要求和我合影,应该就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为我们三十多年的友情留下一份纪念。我深深地为自己的粗心而懊悔,那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我多么应该再陪他多说说说话啊!

王铭兄年长我四岁,是1941年生人。他的父亲是著名侨领王源兴(曾任全国侨联副主席,北京侨联主席)。他祖籍福建龙岩大洋,生于印尼苏门答腊首府巨

汉语歌词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与“音乐”相伴而生的歌词一次次被拉进“文学”的大雅之堂,于是不得不一次次自谋生路的历史。

数千年来,歌词的形式在变化,不变的是它与音乐之间一直如不离不弃的恋人关系。正如我变幻了千万形状,只为与你在一起;正如电影《侏罗纪公园》所谓“Life will find a way”——歌词在一次次眼看要成为僵死的文学之时,总能找到自己的生路。

目前比较认可的“最古老的歌词”,为《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穴(即“肉”字)。两言一句,言简意赅,韵律清晰,已经有了显著的歌词特色。

这首《弹歌》描绘了一幅上古时期狩猎者的生动画面:砍断竹子,又把竹子连起来做成弹弓,弹射出土球,去追逐野兽的肉。《诗》三百,孔子皆弦歌之——显而易见,三百篇都是歌词。经过圣贤的修订,《诗》成了《诗经》,于是也就不再是歌词,而成为了“经”。

作为圣贤门生,“经”当然得一个字一个字去琢磨,每个字写上万言的注疏,辅之以《关雎》,后妃之德也”这样过度解读的拔高。



我眼中的王铭先生

胡荣华

港。5岁到9岁在新加坡上小学。因为在国外出生,他最早学会的是国际象棋,而后来爱上象棋和围棋,应该是他9岁来到北京以后的事了。

王铭兄是不折不扣的“学霸”,他所就读的两所中学都是北京的名校——北师大第一附中、北京四中,而他考取的高校更是了不得——清华大学,所学的专业是动力农机系汽车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后,他先后在长春汽车研究所、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任职。1978年起,他来到香港,开启了他的儒商传奇。

我与王铭兄的相识正是在香港。那是1986年,在香港举办亚洲象棋锦标赛,陈祖德是我们的领队。

陈祖德和王铭兄是老朋友,他时常带我去王铭兄的办公楼。王铭兄的棋瘾大,每天都要下棋。我们第一回见面,就下了几盘棋。他的水平在业余层面上来说是不错的,我让他马一先,可以下到大致平手的样子。这以后,我们几乎每年都会见面。

1988年上海棋院聘请王铭兄担任顾问,需要说明一下,上海棋院的顾问人数不少,而棋院顾问,是经过当时的上海市体委特

批的,王铭兄是唯一的一位。他来上海小住三日,下榻奥林匹克宾馆。没想到这位棋痴,就没有出过宾馆的大门,除了吃饭,其余的时间都在下棋。对棋爱到如此程度,也真是罕见!王铭兄平生最得意一战,自然是“五粮液杯”象棋国际擂台赛中,他赢擂主河北阎文清的一局棋。阎文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曾经获得全国亚军、世界亚军,实力强劲那是不用说的。但是王铭兄这盘棋似有神助,下得特别好,尤其是残局丝丝入扣,让阎文清无法求和。这盘棋我做了评注,刊登在《上海象棋》杂志上。

王铭兄常说:落井下石的事,坚决不做;锦上添花的事,可做可不做;雪中送炭的事,则不仅要

咏唱一变而成为念诵,共鸣一变而成为解读,于是作为歌词的《诗》死亡了,留下那个作为经典的《诗经》。但是人民需要歌唱的需求从来不会变。于是五言的乐府取代了古之四言,而为人们所歌唱。《古诗十九首》如“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已能清晰照见当代流行歌曲的影子。经典的殿堂从不放过任何一种大放异彩的形式,于是你也五言我也五言,歌唱被丢弃了,乐府从歌词成了五言诗,至于五言而七言,总之一次次又从口耳而上了书面,由音乐而成了文学。

即如“宋词”,以词命名,却终归逃不过最后乐谱失传,变为文学的宿命。柳永时代曲子词尚是下里巴人井水前歌唱的“流行歌曲”,不到一百年即完全登上了所谓大雅之堂。

据闻苏东坡所填的词“不谐音律”,通俗说就是写出来的歌词按着曲子唱出来怪怪的,乃是填词者的大忌。但当它失去了乐谱而成了书面的文本,苏东坡的缺点竟成了优点,那不合音律却肆意奔放的文学性和感染力,压过了作为歌词的大忌,反而更为文学上所推崇。

但你文学上推崇归推崇,人民需要好听的歌词,需要能表达自己情感的歌词,于是又一次绝境里开出花朵,那花朵便是所谓“元曲”。

由元曲而至我们今天人所熟知的“戏曲”,由文

王铭兄常说:落井下石的事,坚决不做;锦上添花的事,可做可不做;雪中送炭的事,则不仅要

王铭兄常说:落井下石的事,坚决不做;锦上添花的事,可做可不做;雪中送炭的事,则不仅要

1989年,亚洲象棋联合会副会长、中国象棋协会主席陈远高同志逝世,中国方面希望由陈祖德继任亚象联副会长。但在1990年亚象联召开的会议上,一些国家的与会代表提出担任副会长要出25万元港币。其时国门虽已开放十年有余,但外汇还是十分紧张的。王铭兄作为香港的与会代表,



望月 (纸本设色) 章玲月

言而白话,直到今时今日的歌词,在一次次将成为“死的文学”之际,一次次地绝处逢生,焕发出新的生机。

接棒,当然传到了吾辈手中。

在上海,杜鹃三月底就开了。公园和市中心的绿化带里种植的杜鹃,最常见的是淡粉或艳粉色的锦绣杜鹃。锦绣杜鹃呈漏斗形的花冠有五个深裂,看起来像是五片“花瓣”,但它的花冠在下端是相连的。最上方的“花瓣”上布满深红色的斑点,辨识度相当高。锦绣杜鹃能开到五月初,花量也不小,原本色彩单调的绿地被它繁艳的花朵装点过之后,果真如锦绣一般。除了粉色的锦绣杜鹃,偶尔也能见到白花杜鹃和西洋杜鹃。白花杜鹃的花色素雅,花型、树形和锦绣杜鹃相似,西洋杜鹃则是重瓣,颜色有浅粉和深粉。地处江南的上海,杜鹃虽不罕见,但想看杜鹃花海,还得去滨江森林公园,那里有华东地区杜鹃种植面积最大的杜鹃园。盛花时节在水岸边行走,花团锦簇的杜鹃与水光相映,这烂漫的春光让人几乎忘记了自己正置身都市。园内种植的杜鹃品种近400个,色系有红、紫、粉、白、黄等,大的花如碗口,小的只有纽扣大小。这里的杜鹃花期加在一起可达四个多月,除了春天,6月份、10月到12月初也有花开。上海的杜鹃花展一般是四月到五月。

在真正的山野里看杜鹃其实是另一种

支持中国方面的增补人选,并提供了资金,确保了陈祖德当选亚象联副会长。

1995年,上海队出访纽约,同样遇到了批外汇的麻烦事,结果还是王铭兄这位上海棋院聘请的顾问,赞助了5万港币,使得上海队顺利成行。

而对于初创的全国象棋甲级联赛的鼎力支持,也可以说是真正的雪中送炭。2005、2006年两届象甲联赛,均由王铭兄慷慨解囊,倾力资助。这两届比赛冠名为“启新高尔夫杯”,比赛开闭幕阶段的赛会制赛事均在宁波启新高尔夫球场进行。尽管一年赞助两百万,但这份赞助是很纯粹的不求回报的友情赞助。这是王铭兄的大情怀,令人钦佩!

王铭兄除了爱棋,另一大爱好就是书画。因为他为人耿直、厚道,在“文革”期间与落魄的大画家黄永玉、黄胄结成忘年交。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出版了个人作品集《彦甫画选》。这本由刘海粟题签、黄永玉作序,黄胄写后记的画册,不仅是他才华和心血的凝聚,更见证着他与画家之间真挚的友谊。

当时来上海,他也把这本画册送给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取艺名“彦甫”?他告诉我,他女儿叫王彦,自己不就是彦父吗?谐音可不就是彦甫!

王铭兄走了三年多了,教我怎么不想他?

(杨柏伟 整理)

随着老龄化的趋势加大,老人问题正在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两千多年前西汉礼学家戴圣在他所编的《礼记·礼运》篇中,在批评“独亲其亲,独子其子”的同时,又提出“老有所终”,应当讲,

不是吗?老人有一条年轻人年轻时比不上的专长,那就是阅历丰富。不要小看这个阅历,个人的阅历能从一个侧面印证、折射出历史,甚至可能的纠正历史教科书中个别差错。不错!青年人可以

笔者没有本事再加一条什么,只想把“老有所为”的“为”字具体化,建议在“为”中应包括一个“写”字,那就是“老有所‘写’”。

感觉。我在浙江的天台山赏过艳红的云锦杜鹃,在湖州顾渚村附近的小山上看过映山红。山路旁,杂树丛中偶然探出一株枝叶疏朗的野杜鹃,开得自在烂漫,远非城市绿化带里修得中规中矩的杜鹃可比。某年春天去浙江丽水旅游,爬山时瞥见巨石顶上一丛淡紫的杜鹃,远远望去,心想这样清丽的花

最惜杜鹃花烂漫

林策风

只适合长在这幽谷之中。春末去四川的海螺沟,山道两旁的太白杜鹃和雪山杜鹃有的含苞,有的已经在枝条顶端绽开一簇或红或白的花朵。我掏出相机拍了又拍。看见杂木林里有棵纯黄杜鹃,我兴奋地奔过去,险些在树下湿滑的松针上滑一跤。同伴问我拍的都是些什么花。“杜鹃。”看着他一脸疑惑,随后瞥着眉毛努力思索的样子,我猜他脑子里对杜鹃的认知只是城市花坛里修得齐膝高的柔弱灌木,和眼前这些仙风道骨的巨大树型杜鹃完全对不上号。当地人告诉我们,再过一个月,高山杜鹃就会开得漫山

食物连结了原乡的根脉

小饭

这几年说起作家葛亮,必须从《燕食记》开始谈起。这部《燕食记》的场景,基本发生在粤港地区。通过华南的饮食传统切入,生动描摹出中国近代百年的社会变迁、世事人情、众生百态。

葛亮差不多用六年的时间写了这样一部关于饮食的小说——六年写一部小说显然是作家们并不以为意的事,但用葛亮他自己的说法,“可能会追溯更为久远”,“甚至可算是一种夙愿。”有心的读者会发现在葛亮写作第一部长篇《朱雀》时,他就写到主人公因一碗鸭血粉丝汤连结了与原乡的根脉。后来,食物逐渐成为葛亮小说叙述逻辑的重要因素。

葛亮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在文学这张成绩单上交出了相当完美的答卷。我相信这多少和他的出身有关,在那种知识分子家庭氛围下长出来的树木花果,毫无疑问,就像葛亮浑身上下表现出来的那样:克制、专注、友善、体面,且独立,甚至善于观察。葛亮的家庭来自学院,小时候被认为将来大概率地会单纯进行学术工作。

后来很偶然地,葛亮写了一篇小说,开启了此后的文学创作的路途。这竟然被葛亮本人认为是“令人意外的节点”。随后这一场所谓的意外导致葛亮这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创作。“从实践的角度,你会越来越倾向做熟练的事情。”葛亮说。我能感悟到这句话里面的某种谦逊。在相对年轻的作家之中,葛亮的写作水平很扎实,语言还相当有特色,在写作题材上——与其他年轻作家相比,葛亮的叙事更宏大,更愿意把写作的目标定在历史和当下的某种因果解释中。

葛亮或许也希望被对照在历史脉络中。比如沈从文。沈从文先生对葛亮确实有深远的影响。两位作家同样针对一个年代表达出了人性的淳美,这种淳美中间也包含着人性的砥砺。在沈从文的作品之中,葛亮最喜欢的不是大家都普遍地一致赞美的《边城》,而是他没有完成的作品《长河》。

我们通常认为一个作家的观念可以决定一个作家的高度。“家国情怀”,我在葛亮的作品里经常能想起这四个字。葛亮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家国情怀”可见乎时代铿锵,可见乎君子之道,也可见乎烟火日常。

以后,握不动笔了,他又讲了不少口述史。他不讲,谁能说出动员守卫济南的国民党军长吴化文起义的细节?他不讲,谁能知道首先占领并登上南京总统府的解放军战士半年前还是国民党军长吴化文手下的士兵。看了他的回忆录让人懂得人是可以变的。有水平的人其本事就在于能够化敌为友,化敌为我,而把朋友搞得更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好的回忆录是思政课的辅助材料。

因此,建议老人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写点回忆录。我认识在济南战役和江阴渡江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王征明。他就是多部电影中的“王科长”原型。他在90岁前写了大量惊心动魄的受读者欢喜的回忆录。90多岁

写吧!诸位长者。

遍野。可惜这春山我无缘得见。来自青岛的同事说她父亲常抱怨杜鹃不好种,无论如何精心养护总是蔫蔫的模样,花开得也稀疏。她告诉父亲,上海的杜鹃并不娇贵,只是寻常的绿化植物。父亲开始不信,后来在上海看了街边的杜鹃,悻悻然表示:“毕竟是南方!”看来杜鹃的确择风土。友人沈胜衣长居岭南,他在《杜鹃花下曾读诗》一文里写到了中山大学草坡上各色绚丽的杜鹃和陈寅恪夫妇咏杜鹃的诗。关于家里种的一盆杜鹃,他如此写道:“这盆杜鹃。我从来只是淋淋水,基本没施过肥,更从未修枝、换盆换泥什么的。但它每到春天繁衍都随之拥至,逐日繁艳,粉红夺目(近年则先后神奇地冒出几朵深红和洁白的花朵杂于其中,使我益发惊叹)。最盛期的三月,往往几百朵齐放枝头;至于落了又开的总数,更是数不胜数,美不胜收……”那位青岛种花人如果读了这篇文章恐怕会为之郁闷。

写吧!诸位长者。

梨花给人的印象是素白。李渔说梨花是“人间之雪”。

十目谈
田野春色
责编:徐婉青